

留学史丛书

异文化博弈

◇ 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 ◇

叶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留学史丛书
叶隼 主编

异文化博弈

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

叶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叶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留学史丛书)

ISBN 978-7-301-15150-1

I. 异… II. 叶… III. 留学生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IV. 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5966 号

书 名: 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

著作责任者: 叶 隽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150-1/G · 25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34.5 印张 595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留学史丛书》总序

叶 隽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始终是居于枢纽地位的推动器。文化的异质性越强,外来刺激的作用力往往越深。故此陈寅恪先生有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此理不仅适于国人,对人类整体文明同样具有典范效应。而就这样一种文化交流而言,要言之可分两种,一为达摩弘法,一为玄奘取经。前者是主动走出去的“宣经传道”,有一种宣示宗教福音的使命感在内;后者则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求知向学”,更具追求真理的孜孜之诚。可一旦学术(此处是佛教)中心转移,其情况又变,即为鉴真东渡、阿倍入唐。师、弟位置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但对于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说,其要义当在“采玉他山”,而非“好为人师”。就此看,我们当然可以为隋唐时代的四海来朝而兴奋自豪,但更应关注由法显至玄奘的求学路径。贞观盛世之际走向西域的玄奘,正充分表现了我民族文明求知于世界的“煌煌大度”。正如当代美国虽为世界留学生汇聚之中心,但走向世界的美国学生也并不少见。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如果说以上表现的,是东方文化范围内以佛教为核心的知识中心场域迁变过程的“代表现象”,那么随着世界场域的整体形成与西方强势背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知识场域转向就是很自然的了。不过,我们还是将目光集中到随着现代科学与学术制度发展而形成的近距离时段中来。19世纪初期的洪堡改革一举确立了德国大学在世界学术与科学场域的中心地位。而有趣的是,“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①。这一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是本国的留德学生。

此处仅以中国之求知于世界为例,稍作探讨。近代中国虽然早已有有识之士如容闳等提出派遣留学,并有高层政治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张之洞等予以呼应,但其筚路蓝缕之艰难,仍远超乎后世想象。故此,从官派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乃至轰轰烈烈的留日潮,虽不乏优异人物出现,但往往属于个案现象,就整体言则往往难免或“浅尝辄止”、或“鱼龙混杂”、或“见木不见林”等弊端。而其时中国面临的老大帝国之病与难,使得留学所承载的功利化倾向暴露无遗。早在1910年代,身为留美学生的胡适作《非留学篇》,对留学提出异议:“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度时伤财事倍而功半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②此处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其特殊语境中完全可以理解,但却不能作为一种求知向学的纯正心态。到1920年代,潘光旦撰《留学生问题》,继续追问:“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③对中国留学史深加反思,其致用思绪表露无

① [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第3页,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胡适:《非留学篇》,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1914年1月。

③ 潘光旦:《读书问题》,第18页,上海:新月书局,1931年再版。

遗：“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轫，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这是谁的过失？”^①这样一种比较视野的纳入，当然很有参考价值，但中、日近代留学史的成绩或许还有待“百年之后论高下”。毕竟，一时之权力得否，不能作为终极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②，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留德群体，最后将日本带向了何方呢？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诚哉斯言！可具体言之，对外来资源究竟是“全盘照搬”还是“批判接受”，这是事关根本的大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浩瀚，并成为世界史上唯一的一个作为古国而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其兼收并蓄、博大能容。诚如蒋梦麟所言，“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③。可这样一种吸收能力是如何表现的？它究竟有无特定的规律可循？对当下的中国发展进程来说又有怎样的资鉴意义？若要探讨这样一些本质问题，留学史无疑提供了最佳对象。

自舒新城1928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中国的留学史研究可谓勃然而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国内对留学史的研究显然更上台阶，不仅论文数量众多，而且出现了较有分量和深度的著作。对此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不仅基本的史实得到梳理，而且也开辟出很多具体而深入的论题；但此种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从呈现。而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呈现又是如何与其留学背景（兼及学术与整体）产生深层的思想关联，更是值得具体探讨、很可能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的最佳命题之一。

可喜的是，外国学术语境里对中国留学史的兴趣与贡献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不但实藤惠秀写出了那部被费正清誉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

① 潘光旦：《读书问题》，第19—20页。

② 有论者进一步认为：“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个巨大的失误。”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北京，第76—77页。

③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载明立志等编：《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33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作”兼“广泛而先驱性的拓荒工作”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①,而且德、法、美等国学人在相关领域也各有贡献,诸如韩尼胥的《1860—1945 年中国留德学生的历史和影响》、Stacey Bieler 的《“爱国者”或“叛徒”——中国留美学生史》^②、森时彦的《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等^③,当然其中也不乏华裔学者或留学生的身影,如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④、王枫初的《移民与政治: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 1919—1925》^⑤、Ye Weili 的《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⑥、孟虹的《中国人留学德国教育(1861—2001)》等都是^⑦。作为一种明显的跨文化群体的研究,在日、法、德、美等不同的学术语境里,虽然都关注的是中国人留学史,却显然更注重留学国文化的重要性,这方面是很可与国内学者的视角成“相辅相成”关系的。

既然如此,我们仍不禁要追问,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史反思视域中,推出一套“留学史丛书”,其意义究竟何在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引进世界学术范围内的他山之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推陈出新”,为汉语学界进一步推动留学史研究助一臂之力。具体言之,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尝试,能够兼顾以下几个视角:

一是中国与世界。我们不仅要探索以自身为主体的历史,同样也要关注作为世界文明整体的助推器的世界留学史研究。当中国正在经济、政治诸方面崛起于世界,世界也在以一种超常的眼光期待中国之时,我们首先需

① 《译序》,第2页,[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② Bieler, Stacey: “Patriots” or “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2004.

③ [日]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小史》,史会来等译,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 1872-1949*.

⑤ Wang, Nora: *Emigration et politique: les é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19-1925*.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2.

⑥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以中国的名义寻求现代性:1900—1927 年的中国留美学生).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 Meng Hong: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 Wien: Peter Lang 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5.

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国气魄”。譬如说,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即使“身不关己”,也应当予以关注,如以上提及的美国人的德国留学史,就颇值得探究;同样,日本在近现代崛起过程中求知于世界的留学史,也足为中国人留学史之最佳参照。即便是在我们已有相当积累的中国留学史领域,也要特别强调一层“重思”的意义,至少应当注意到涉猎国别的全面性,即由欧洲主要国家如德、法、英拓展到美、日、俄等世界性大国;并进而考察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西方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其他东方国家如印度、埃及的中国人留学史。此中特别强调的是留学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结合,特别注重国别文化资源的特殊性意义。

二是宏观与个案。在强调国别史研究的同时,在现阶段还需要更多的个案性研究,也就是说要将留学史(包括国别史)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相当数量的个案之深入探究的基础之上。而在具体研究中,也应更加注重个案研究与大学史、学术史研究的融通维度。这既包括对重要留学人的专门研究,如以陈寅恪为个案,考察其留学多国的阅历;也意味着推出新的研究范式,将留学人留学不同国别、不同大学而获得的不同思想资源转化于现代中国文化场域实践过程之中,如以吴宓、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人研究,就应更看重其分别师从白璧德与杜威的背景,而归国后又分别为“学衡派”、“新文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史位置,将美国自身思想路径的分化(背后涉及欧洲文化内部异途的世界性思想潮流变更)与中国的思想分化充分结合,将现代中国更具体地落实到世界场域之中去。

三是现代与传统。我们在考察以现代为主体的留学史进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复归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对思想资源的主动汲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沉入历史”。譬如对于中国而言,更长距离的留学史迹需要仔细爬梳,如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留印历程究竟是怎样的?而日本留学僧、留学生的来华历程,同样也值得细加清理。而注意到现代的维度,则涉猎范围既以文化史、思想史为关注中心,同时又更加关注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动功能,使得单纯的留学史、文化史研究通过思想史这一中介,更密切地与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从留学史这一特殊视角切入,提供一种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主要文明成长过程的新的观察角度,或许,可以由此更好地揭示出发现某种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可能。至少可以承认的一点是,舒新城当年所指出的事实至今并无根本改变,即:“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

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或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①留学史研究的意义显然并非“无足轻重”。希望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不曾辜负了留学史上那些星光闪耀的前贤巨子！

2009年3月23日于北京

①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28年。

序：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

巴斯蒂

这是一部非常有趣且有独特意义的深思之作，内容关乎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知识生活，对于那一代渴望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年轻知识精英来说，如何借鉴和使用西方思想成为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

尽管此前已有很多关于不同国家间在艺术、科学、文学、信仰、习俗和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联系、交流或影响的优秀著作，但有关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仍像一个谜一样的东西有待解开。当然，我们也可以客观地来提供一些答案的尝试：数量众多的翻译著作、外国语言的授课课时甚至是频繁地去外国旅行。但不同文化间的思想和形式传播，包括其接受方式，完全取决于个体中介的功用。每个个体的趣味、直觉、敏感度、习惯、生性和背景都将引导其选择，并以特殊的方式产生了其影响。另外，相对于每一种广阔无垠的外国文化整体而言，每个人实际上只不过掌握了其中某些碎片而已，或者只是他人如中介者所了解的异文化的一部分。当他获得了遥远文化的碎片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他实际上是重新创造了这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背景来理解原有文化的。

故此，为了认知 20 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必须重视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西方文化资源，其媒介、（载体）性质、程度及效果都值得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很多人都对全球化的表面形象感到焦虑，我们今天需要说服自己的是，不仅是通过物质需求与经济利益的裹挟，而且是出于精神自由的带动而使中国走向了全球化。对历史的再审

视将强化不同人种间和平的文化交往,世界的未来应该是和平,而不是由利益冲突所统治的文化所主导。

20 世纪初,那些最开明的欧洲人对于将外国文化介绍给中国所能产生的作用持有怀疑态度。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法国政府就考虑在北京建立一所学校以培养中国的新的现代化精英人物,就像它在奥斯曼帝国及其他国家所成功完成的那样。其初衷在于防止再次出现新的荒唐情况,即政府的保守主义者与大众的愚昧无知联合起来,再次使得仇外的暴力行动爆发。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外交部长德尔嘎赛,他咨询了古斯特·吉拉德(1852—1922),他是 1894—1897 年间的法国驻华公使,随后转任法国驻布鲁塞尔公使,但继续关注中国事务。他认为这个计划是无用而且危险的,所以法国政府放弃了这个计划。实际上,作为一位非常有文化修养且仔细在近处观察了 1898 年改革运动(戊戌变法)的外交官,吉拉德的判断是有论据的,他有着一个宏阔且清醒的对中国文化变迁的看法:

由于北京的特殊性,由于它处于不同的强权国家势力的竞逐之中,其结果就是难以避免的中立,所以它绝对不可能只保持一个国家的痕迹,它要么是中国的要么就是国际的。此外,北京是中国文化的绝对中心,所以它不可能变成外国某一个特定民族的学派的总部。要改变中国不可能在北京,改变中国的机会也不是从北京诞生的。从西方文化的那些真正的和伟大的中心传来的光芒,从巴黎,从伦敦,从柏林,也要比那些即便建立在孔庙门前的法国学校、英国学校或者德国学校的太近的光芒,更加闪烁光辉,更加有效灵验。更不用说北京也具有极强的吸收与同化功能,就像所有伟大的圣城那样,如雅典、罗马、君士坦丁堡、瓦腊纳溪、京都,其他文化都不可能与它分庭抗礼,除了通过暴力之外……所有的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嫁接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于一个由儒学培养形成的中国人来说,要求他向我们的科学方法、生活理念、社会、国家打开他的精神世界是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简直需要另一位孔夫子才能实行那场极端的改革、那场深刻的革命。另外,中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彻底和突然的转型的能力。在借鉴与接受影响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是缓慢的、有独特性的、自主的。事实上,与其说中国人在改变,不如说他们是在改变着那些向他们提供资源者。

中国文化不会向外来文化屈服:它善于同化,它会使其他文化必须

进行必要的修改。所有想迅速进行而改变中国文化的变革都不会成功，并且会导致反抗和阻力。^①

这位法国外交官在1901年的反思非常敏锐地指向复杂的问题，这正是叶隽的研究所要探究的。这种理念首先表现在此著书名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异文化博弈”。

叶隽此著的价值在于突出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相比较晚清文人及其后由中国史学家与公众所使用的“西学”概念，他尤其注重揭示了欧洲思想的特别贡献，在其后的美国思想的贡献路径，以及两者之间在很多维度上的不同之处。但他的分析走得更远：它揭示并比较了在这一整体中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选择外来文化资源意味着对上个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窗户，而对这些资源的批评性清理工作则让人们发现了这种选择所意味的挑战和风险。实际上，叶隽的研究集中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三位杰出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关联，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定特定的欧洲文化的信徒：严复，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阐释者；李石曾，法国启蒙运动的鼓吹者；蔡元培，德国理想主义（又译唯心主义）的虔信者。在多种语言的广泛材料支撑下，叶隽细致观察了三个个案人物的个体语境，他们每个人都偏向一个特定的国家，接受其文化的因素并将之化为己用。他深入的研究指出，在那个时代，对于在它的文化传统中熏陶培养出的中国人而言，外国文化世界就像一个棋盘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棋子，都为了推动自己的地位并使用其优势棋子，他们这么做就像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财政利益与军事利益那样。

对于那个想进入这种博弈格局的人来说，为了一个棋子而下赌注，它带来的风险就是放弃其他人得到的好处，乃至他会被这个棋子的主人所左右。一个符合这种情况的很好的例子是这样一种比较，即马君武与蔡元培在战争中对德国的态度反差，前者支持，而后者则认为德国人应该对此负责任，为什么如此值得追问，也许是无意识，但非常明显的是，他们反映了自身其时所处国家的不同宣传口径，当时马在柏林，而蔡在法国。通过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观察和考订，尤其是对严复、李石曾和蔡元培接受的影响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源及其变形的考察，叶隽指出，融合进中国文化中去的欧洲

^① 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的外交通信。新系列 581，pages 218—223，1901 年 12 月 31 日吉拉德由布鲁塞尔（Auguste Gérard）致外交部长。

思想资源也成为一盘世界文化大棋中的棋子,在1930年代,世界文化事实上已囊括了中国文化。

要想将异文化博弈的思想在文化的互动功用方面很好地表现出来,当然还需要其他精细的研究工作,但必须确认的是,适用于研究20世纪初期的这部著作,提供了一种具有启迪意义和可复制性的研究模式。

这本书还讨论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即非常丰富且扎实地解释了外国文化向中国文化转移过程中的留学的角色。就像吉拉德在1901年所预言的那样,正是这些与欧洲文化创造中心如伦敦、巴黎和柏林的直接和持续的联系,才对中国精神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些首都的留生活让这些青年中国人不仅对这些思想产生兴趣,而且让他们信仰这些思想并产生一种自我认同,因为那些外界的环境包围着他们,特别是他们会行动起来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实践这些思想。在这方面,经由严复、李石曾和蔡元培发酵传播的知识因素的贡献甚至超过经由日本传播西学的梁启超的无数文章,而对五四那代人的精神养成起到了塑型的作用。

最后,正是在北京,严复、李石曾和蔡元培都试图将自己的外国经验运用于实践。他们遭遇了困难和竞争,他们所不得不进行的事业调整,他们的思想的被平庸化,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北京作为首都与文化更新的熔炉的特殊性,对创新或新事物的怀疑态度,以及对外部事物本土化的巨大能量。北京的文化独特性不在于创造时髦的东西,譬如像上海、伦敦或巴黎那样创造流行风,它的风格在于能使外来的东西融入到国学之中。

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涉猎的传记研究的质量。对于理解本书讨论的三名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来说,实际上必须很好地理解他们有机会留学的所在国文化。严复在格林威治留学的那两年间所学习的课程计划就完全不同那个时代英国大学的一般课程。它包含相当一部分关于航海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因为这是为军官所提供的一种教育,是一种指挥官的预备教育,包括普遍历史、政治、法律、经济学、道德哲学和战略学的基础概念和知识。它不涉及理论思考,而关乎行为实践。

更多的活动肖像集中于李石曾这个人物身上,根据叶隼的看法,我首先感到惊奇的是他将李石曾的思想定义为“文化浪漫主义”,把浪漫主义这种东西归因于留法背景。过去我曾经采访过的李石曾的朋友或故旧用如拜伦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李石曾。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制定计划与从事各种活动,这当中总是会包含有实践性和商业利益。女士们回忆他时总抱怨说他散发出浓烈的大蒜味道,他的口袋里总是有一些蒜瓣,据他自称是为了卫生

学的原因。他经常发表非常混乱、抽象且不可理解的长篇大论式的谈话。他很少忘我于情感，他知道怎么控制激情。

对于那些经常与李石曾交往的法国人来说，就像那些从18世纪直到今日的我的大多数同胞们，他们被认为是“笛卡尔精神”，对于国民性格而言，这就意味着理性与理性主义者。实际上，公立中学教育机构的教师界是李石曾在法国最初接触的关系网络，他们属于强烈反神权的理性主义者，并且一起坚守着科学的社会教条，他们为这位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所有法国文化的经验与资鉴。当李石曾在蒙岱寂做寄宿生的时候，关于“理性”的思想是他所在的农业学校的课程内容，接着他在巴斯德学院和其他地方的学术机构上了“自由”课。这种对理性及启蒙的崇拜正走向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就像它被滥用时一样，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初期，这比合理性更能反映出一种教条与迷信。

在第三章的开头叶隽特别解释了他关于“浪漫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受到德国“狂飙突进”概念的影响。他试图将这个概念在非常积极的意义上进行使用，当然是将法国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理想化的表述。根据我自己所观察到的经验，当普通中国大众表示“法国人很浪漫”的时候，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认为法国人的行为是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不合理或者不从众的。中国人关于法国人的传统观点实际上是对这种被夸赞的国民性格“理性”的相反看法。就像我们从来不能对自己做到客观一样，中国公众的观点毫无疑问表现出某种真实的一面。不管怎样，李石曾表现出的，确实有一般中国人看待法国人的“浪漫主义”的一面。他的混乱而个人的自愿精神究竟仅仅是来自于法国影响，或者也有一部分来自天性生成的气质？我不想在这里冒险作出一个判断；另一方面它也只是个逸事性的细节。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叶隽通过研究所达致的成果。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复原了已经被遗忘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而这一面对于更新中国的思想库以及刺激他们的创造性思想产生是极为有益的：20世纪初的思想潮流通过多样性的欧洲文化资源得以成熟起来，并且通过原创性的思想使得文化及其与政治的关联生机勃勃。

2008年7月于巴黎

（叶隽译，安延校；译文经巴斯蒂教授审定）

Préface pour Ye Jun
Le jeu des cultures étrangères-L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Europe à l'époque contemporaine et la
fonction des sources intellectuelles
anglaises, françaises et allemandes en Orient

Voici un livre de réflexion intéressant et original sur la vie intellectuelle chinoise du premier vingtième siècle, quand la connaissance et l'usage de la pensée occidentale deviennent le souci dominant d'une jeune élite lettrée qui aspire à construire une nation moderne.

Bien que beaucoup de bons travaux aient été écrits sur les contacts, les échanges ou les influences d'un pays à l'autre dans le domaine des arts,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des croyances, des coutumes et de la vie matérielle, l'interaction entre les cultures reste au fond un mystère. Certes, on peut en proposer des mesures apparemment objectives; le nombre d'ouvrages traduits, les horaires de langues étrangères dans les programmes scolaires ou la fréquence des voyages à l'étranger. Mais la transmission des idées et des formes d'une culture vers une autre, aussi bien que leur réception, s'effectue toujours par l'intermédiaire d'individus. Les goûts, les intuitions, la sensibilité, les habitudes et les circonstances personnelles de chaque individu orientent ses choix et pèsent sur ses adhésions de façon singulière. Chacun, d'ailleurs, ne saisit jamais que des fragments du vaste ensemble que constitue une culture étrangère, ou de ce qu'il en apprend par le truchement de connaisseurs. Et lorsqu'il s'approprie ces lambeaux de cultures lointaines, chaque esprit, à vrai dire, les réinvente en son for intérieur car il leur assigne alors un sens et une fonction dans un contexte différent de celui d'origine.

À considérer l'histoire tumultueuse de la Chine du XXe siècle, l'emprise qu'a exercée la référence culturelle occidentale, ses vecteurs, sa nature, son degré, ses effets méritent des enquêtes très précises. Nous avons besoin en effet aujourd'hui de nous persuader que la mondialisation où la Chine a été alors

entraînée, a été portée par la liberté de l'esprit et non pas imposée seulement par la contrainte matérielle et l'intérêt économique. Ce besoin est l'expression d'angoisses partagées par un large public, à travers tous les pays, devant les apparences actuelles de la mondialisation. Le réexamen du passé voudrait affermir l'espoir d'un avenir mondial animé par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pacifiques entre de multiples communautés humaines, au lieu de dominé par les affrontements de la force et du profi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les Européens les mieux informés restaient sceptiques sur l'effet de l'introduction des cultures étrangères en Chine. Aussitôt après le soulèvement des Boxeurs,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envisage de créer à Pékin une école pour former en Chine une nouvelle élite modernisatrice, comme il l'a fait avec succès dans l'empire ottoman et ailleurs. Il pense empêcher ainsi qu'à nouveau, l'alliance entre le conservatisme des gouvernants et l'ignorance populaire ne produise des explosions de violences anti-étrangères.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lcassé, chargé de l'exécution du projet, consulte Auguste Gérard (1852-1922), ancien ministre de France à Pékin de 1894 à 1897, qui continue de suivre les affaires chinoises au poste de ministre de France à Bruxelles. Gérard juge le projet inutile, voire dangereux, si bien que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y renonce sans appel. En effet, les arguments de Gérard, un diplomate très cultivé qui a observé de près le mouvement de réforme de 1898, embrassent une perspective large et lucide sur la transformation culturelle de la Chine :

“Il est de l'essence de Pékin, de la concurrence que s'y font les diverses Puissances et de la neutralité inéluctable qui en résulte, que rien de ce qui se crée dans cette ville ne peut conserver l'empreinte d'une nationalité unique, cela devient soit chinois soit international. Pékin, d'ailleurs, est trop resté le centre de la culture chinoise pour devenir le siège d'une école étrangère de nationalité déterminée. Ce n'est pas à Pékin même et de Pékin qu'il y a chance de transformer la Chine. Le rayonnement lointain des vrais et grands centres de culture occidentale, de Paris, de Londres, de Berlin, est bien plus vif et plus efficace que ne serait l'éclat trop proche d'une école française, anglaise ou allemande établie à Pékin même, à la porte du Temple de Confucius. Sans compter que Pékin exerce, comme toutes les villes saintes, Athènes, Rome, Constantinople,

Bénarès, Kyoto, une telle vertu d'absorption qu'aucune influence égale ou rivale ne saurait à la longue s'y maintenir, sauf par la force... Toute greffe d'une civilisation sur une autre exige un long espace de temps... Quel effort pour un Chinois élevé à l'École de Confucius que d'ouvrir son esprit à nos méthodes scientifiques, à notre conception de la vie, de la société, de l'État. Il faudrait presque un autre Confucius pour opérer une réforme si radicale, une révolution si profonde. Le Chinois, au surplus, n'a pas, comme le Japonais, la faculté des transformations complètes et soudaines. L'évolution du Chinois est lente, originale et autonome jusque dans les emprunts qu'il fait et dans les influences qu'il subit. Ce n'est pas le Chinois, à la vérité, qui se transforme, c'est plutôt lui qui transforme tout ce qui s'offre à lui.

La culture chinoise ne cédera pas à la culture du dehors; elle se l'assimilera, en lui imposant les modifications nécessaires. Toute tentative pour transformer trop vite et de trop près la culture chinoise n'aura d'autre effet que de provoquer des résistances et des réactions... ”^①

Les réflexions de ce diplomate français en 1901 pointent précisément vers les questions complexes qu'examine la recherche de Ye Jun. Il s'agit d'abord de la notion qui donne au livre son titre: “le jeu des cultures étrangères”.

Ye Jun a le mérite d'attirer l'attention sur la diversité des cultures sous-jacentes au terme de “savoir occidental” utilisé par les lettrés de la fin des Qing et après eux par les historiens et le public chinois. Il s'attache à mettre en lumière l'apport spécifique de la pensée européenne, antérieur à l'apport américain et différent de lui à beaucoup d'égards. Mais son analyse va plus loin: elle révèle et compare le rôle distinct de trois composantes majeures dans cet ensemble-culture anglaise, culture française, culture allemande. Cette recension critique des références culturelles étrangères ouvertes aux intellectuels chinois à l'aube du siècle passé fait découvrir concrètement les enjeux et les risques liés au choix de chacune. En effet, l'étude de Ye Jun est centrée sur le cas de trois personnalités éminentes du monde lettré de l'époque, liées les unes aux autres, et adeptes cha-

① Archive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Chine, nouvelle série, volume 581, pages 218-223, Auguste Gérard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Bruxelles, 31 décembre 1901.